

·旧学与新知·

主持人：徐 雁

·拂云楼·

顾志兴《浙江藏书史》的文化学术贡献

阎燕子

浙江历史文献研究家顾志兴先生所著的《浙江藏书史》(杭州出版社2006年10月版),是浙江文化研究工程之一。本书是作者在其《浙江藏书家藏书楼》(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)基础上,经过多年积累和修订、充实成书的。由著名学者傅璇琮作序。

全书以时代为主线,以私家藏书为主,兼及宫廷官府、书院、寺观藏书。正文内容的安排上以时代为序。每章开篇介绍藏书背景,后列私人藏书家,总结私人藏书风尚(唐五代之前、元,以及民国时期略去),下接官府、书院、佛寺道观藏书。将浙江自古以来藏书风貌展现无遗。

一、浙江藏书文化兴衰的一轴长卷

1. 藏书体系,面面俱到

我国古代藏书,通常认为有私人藏书、官府藏书、书院藏书以及佛寺道观藏书四大体系。在本书中,作者对以上四部分及至民国时期兴起的公共图书馆均有涉及,且系统全面,疏密有致。

结构安排上,按章节划分。总体以时间为序,分章排列。章下有节,分私人藏书、官府藏书、书院藏书、佛寺道观藏书四大部分。其中,对私人藏书之介绍尤其细致,官府藏书次之,书院藏书更次于其后,佛寺道观藏书常常是简而述之。各节之下严格按路、府划分,顺序依次为:杭州府、嘉兴府、湖州府、宁波府、绍兴府、台州府、金华府、衢州府、温州府、处州府。不论私人、官府、书院、寺院藏书皆是以此为序。这样的排序也正是体现了各州府在浙江藏书史上藏书地位的顺序。元代以前,各府名称略有不同,但大致方位一致。并非各府在各时期都一一介绍,视其时藏书状况而定。

除藏书外,作者对与藏书有关的其他环节亦略有提点,如影响藏书盛衰之因素、藏书风尚等等。以下分述之。

2. 藏书盛衰俱有因

《导论》中提到,吴晗先生曾论说:“藏书之家,插架亦因之

愈富,学者苟能探源溯流,钩微掘隐,勒藏家故实为一书,则千数百年来文化之消长,学术之升沉,社会生活之变动,地方经济之盈亏,固不难一一如示诸掌也。”事实确是如此。

在《浙江藏书史》中,作者不仅关注到藏书家、藏书楼现象本身,亦对影响藏书事业的诸因素进行了探索和总结。

浙江藏书事业兴起于两宋时期,与其时经济文化背景相关联,顾志兴先生在书中将其原因概括为经济发达、文化教育事业发展、学术思想活跃、雕版印书盛行等。

而元代藏书事业发展缓慢则出于兵祸和征调,同时元代浙江仍是印书中心,“书种”不断;再者,文化教育发达,文人代出也是其发展的原因之一。

至明代,经济发展、文教发达,加之刻书业、图书流通业和藏书传统的影响,藏书事业出现繁荣。

有清一代,浙江藏书事业超过了宋、元、明以往任何一代,从而达到了鼎盛时期。满清入关后,确立了“兴文教,崇经术,以开太平”的文教政策。清政府一方面采用科举考试等手段笼络士人,另一方面又对不利于统治的思想言行进行残酷的镇压,大兴文字狱。清政府还大规模地举办修书活动,最著名的有乾隆时期修成的《四库全书》等。通过修书,清政府不仅保存了对统治有用的文化典籍,也禁毁了大量对其统治不利的书籍。十六七世纪,天主教传入,西方科学知识随之而来。士子们不得不改变过去的学风,从空谈心性逐渐地变而以实事求是为宗。同时,文字狱使许多士子害怕招来杀身甚至灭门之祸,于是就埋头于故纸堆里。这样就形成了一种只顾古书古义而不重视现实斗争,最后导致学术与现实生活脱离的学风。但也促进了读书、藏书风尚。

1912~1949年间的浙江藏书事业,作者将其分为两个阶段。一是1912至1937的二十六年间。私家藏书承清代藏书之余辉;1936年更是由浙江省教育厅发起、浙江图书馆承办,在杭州举办了浙江省文献展览会,诸多藏书家、藏书机构尽出所藏珍籍进行参展。这一时期公共图书馆发展也较为迅速。二是

1937至1949年,侵华日军入侵浙江,藏书事业遭受空前浩劫。通过作者对各时期经济、文化背景的介绍,我们便不难理解藏书事业兴衰起伏的前因后果了。

二、浙江私家藏书活动的一面镜子

1. 不绝如缕的私家藏书活动

本书《导论》称:“私家藏书在浙江藏书史上占有最辉煌的一页,许多著名的浙江籍学者,既以其学术业绩称名当世,流布后世,又以保存古籍、搜书、看书、护书、校书、藏书嘉惠后人,对传布文化、培育人才起了很大的作用。”

上启东汉下至民国,全书提到私人藏书家400余人。由唐末五代之前的不足20人,历经宋元明清的发展,至民国已达百余人之多。作者将历代大小藏书家搜罗殆尽,介绍上也是详略有致。从对两宋秀州岳珂、明代湖州臧懋循等史上无名藏书家的考证上,可窥作者搜罗详致之一斑。

对私人藏书的介绍,遇藏书大家,作者则先叙述生平及著作等,再介绍藏书历史及所藏特色,后历数藏书楼之沧桑。对清宁波府藏书家黄宗羲的介绍即是如此:先以姓名字号开头,再列举学术著作,简述学术地位,后述其生平、藏书历史、藏书楼——续钞堂的变迁。对历史上名垂千古的藏书家以及如雷贯耳的藏书楼,作者的介绍更是详尽之至。明宁波府范钦及其天一阁、清湖州府陆心源及其皕宋楼即是其中之一。

历史上也不尽是如范钦那样的藏书大家,因此在叙述上也不必多费笔墨。若遇泛辈,则简单介绍姓名字号生卒、藏书概貌、著述情况等,有的甚至一语带过。如详细介绍完民国杭州的私人藏书家33人之后,又简单列举44位杭州本地抑或外地寄寓杭州者。

以诗词著称的李清照、郁达夫等也与藏书结缘。李清照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享盛名的女词人。其《如梦令》《渔家傲》等作品脍炙人口、久唱不衰。而李清照之藏书,作者称其为“文事之余”,然却“成绩卓著”。“李清照的藏书活动,青年时期在河南开封,中年时期在山东青州,而晚年则主要在浙江。”她与其夫赵明诚酷爱金石古器、典籍书画的收藏。靖康之难时,二人为护藏数年收藏之物,先去书之重大印本者,又去画之多幅者,又去古器之无款识者,后又去书之监本者,画之平常者,器之重大者,“后青州故第的十余屋书册什物尽遭兵燹,化为煨烬”。其夫亡,李清照不弃收藏之事,聚之又散,散之又聚。在《金石录后序》中,她却说道:“有聚必有散,乃理之常。同是两宋杭州藏书家的周焯在《清波杂志》中也有‘聚而必散,物理之常’之说。而顾先生却感叹‘藏书之乡的浙江,未能成为清照提供一个一展身手的舞台,而只能留下失书的痛楚。’郁达夫之风雨茅庐以其所藏类书、明末清初之禁书、诗词集以

及英法德日之外文书称富。由此可见,书之读与藏密不可分,若能真正藏以致用、用而藏之,那么做学问与藏书二者之鱼与熊掌便可兼得也。

除平铺直叙的介绍外,作者在书中也多辑佚藏书家之传世轶事,读来颇有些趣味。

如明宁波府范大澈为范钦之侄。曾从范钦天一阁借书,遭到拒绝,心中十分不悦,于是不惜高价购求海内异本之书,每得一书,知为天一所未有,常具酒茗迎范钦至家,以所得书置几上,范钦取阅之,默默而返。

藏书之人无不好书。明代吴农祥、吴农复昆仲为不受干扰、专心致志读书而除去楼梯,相戒不闻世事,尽发祖、父及兄弟所藏书以读之。明绍兴府祁家 有遗书五七架,藏之室外楼上。他每逢上楼,时时启匙取观藏书,虽不解书之经旨大义,但摩挲藏书,即使母亲催促其下楼,犹恋恋于书籍不肯下楼。“金华府宋濂更是‘自少至老未尝一日去书卷’。”

浙江历代藏书家,为了收藏古籍,有的节衣缩食,倾囊以购;有的穷年累月,历尽艰险,四处搜求;有的每间罕见珍本,白发孤灯,握管抄誉。清时湖州府丁杰又是一例。丁杰少时家贫,无以致书,就书肆读书,自朝至暮以为常,书肆主人悯之,为具食,不食。清绍兴府李慈铭自云:“予性喜书,幼即私购之,乃苦家贫,生平无他嗜好,出入起居,无非皇皇于书,一食一饮,亦非此不乐。有一必读之书未置者,即若为深耻之事,往往形之梦寐。”又“日来贫甚,今晨命奴子卷絮被质钱十五千,适问月携武进臧玉林《经义杂志》一书来,遂以购之”。此类事例,在书中也是屡见不鲜。

除藏书家,私人藏书部分最值得注意的便是私人藏书楼了。藏书楼之名、之结构等都是作者关注的话题。明嘉兴府郑晓之百可园取自“咬得草根,百事可做”之谚;冯梦祯因藏王羲之《快雪时晴帖》而名藏书处为“快雪堂”;清湖州府蒋汝藻藏周密《草窗韵语》,故名之藏书楼为“密韵楼”。天一阁之防火措施更是令人称道。作者在书中总结道,天一阁只是一座普通的木构建筑,其得以长久保存,一是书楼与生活区相距较远;二是有严格的防火措施,任何情况下不得携火种进入书楼;三是阁内有水池,以便不时之需;四是阁之两旁有较高墙垣,以防邻居失火延烧。此类措施在今天也是值得我们借鉴的。

2. 从宁波万卷楼到天一阁

对于天一阁,鉴于其浙江藏书乃至全国藏书历史上的重要地位,作者不吝笔墨,对其条分缕析、抽丝剥茧,将之历史沉浮重绘于读者面前。

天一阁拥有440余年的历史。对范钦及天一阁的介绍,作者分为以下七个部分逐层展开:

范钦生平及天一阁建造时间、形制、命名由来;天一阁藏

书来源及特色;天一阁及藏书得以长久保存的原因;天一阁藏书的几次流散;天一阁书目和藏书印;天一阁范氏藏书的传承;天一阁现状。

由此,即便未接触过天一阁或者对天一阁知之甚少的读者,亦能从中窥探一二。黄宗羲曾慨叹道:“尝叹读书难,藏书尤难,藏之久而不散,则难之难矣。”而天一阁历数代而不衰,除范钦曾立下“代不分书,书不出阁”的遗训、防火制度严格外,其在书籍的防潮、防蠹等保护图书方面亦有其独特之处。范氏后裔中也颇多世守祖业的藏书家,至1949年范氏子孙无力经营天一阁而将其捐赠给国家,天一阁在范氏手中传承达十三代之久。可谓藏书史上之一奇观也。

相形之下,诗中的铁琴铜剑楼、韶宋楼、八千卷楼、海源阁等的楼毁书散是显得无比凄寥。《藏书记事诗》中“烟波四面阁玲珑,第一登临是太冲。玉几金峨无恙在,买舟欲访甬东”一诗同样也是对天一阁的历数代而不衰表示了赞赏。

与天一阁相关的另一座藏书楼——明丰坊之万卷楼,原同在宁波。丰氏历代为官,其家族藏书始自宋朝,至丰坊历16代,故所藏实为自宋至明世代藏书。丰坊曾任明嘉靖年间礼部主事,后罢职归里,尽卖祖传田产千余亩购求典籍、书帖,藏书五万卷。晚年得心疾,整日潦倒于书淫墨癖之中,不善治家,其所藏宋刊本,抄本,被门生窃去十之六七。后万卷楼失火,损失过半,遂以其幸存所有藏书及住宅俱授予范钦。因此,万卷楼藏书成为天一阁所藏主要来源之一。

3. 丁氏八千卷楼与陆氏韶宋楼

晚清四大藏书楼:山东聊城杨绍和之海源阁、江苏常熟瞿镛之铁琴铜剑楼、杭州丁氏之八千卷楼、吴兴陆氏之韶宋楼,后两者原均在浙江省内,时至今日,却均花落他家。

丁氏为藏书世家。其祖丁国典慕先世闻人丁凯藏书八千卷之雅士,在杭州营造藏书楼,名之“八千卷楼”。丁国典之子丁英继父志。丁丙、丁申昆仲在祖、父的影响下,也酷爱藏书,建藏书楼嘉惠堂,其藏书室包括八千卷楼、小八千卷楼、后八千卷楼等。“八千卷楼”之名沿用其祖父之楼名。

韶宋楼原地处藏书之乡湖州。楼主陆心源之藏书楼有三:一即为韶宋楼,专藏宋元本;二为十万卷楼,专藏明以后的秘刻及精抄本、精校本;三为守先阁,贮藏一般书籍。其藏书总数在15万卷以上,宋版书达百余种。陆心源之子陆树藩曾在朝为官。八国联军侵华之时,发起组织救济善会,营救滞留京津的南方官员商民,还对北方灾民发放粮食、开办医疗局、治病发药。1902年救济善会解散之时,欠款十余万,悉数落于陆树藩头上。陆变卖家中古董尚不足支付欠款,同时丝厂倒闭、钱庄破产。1907年6月以十万元之价将韶宋楼、十万卷楼、守先阁之藏书尽数授予日本静嘉堂文库。有人称之为“我国文

化史之惨祸”。

4. 私家藏书活动的学术建树和文化贡献

作者从以下五个方面对藏书家于文化之贡献作了分析:

一是保存和传播中国古代文献,浙江藏书家为后人准备了知识宝库;

二是中华文献遭受兵灾时浙江藏书家挺身而出,不顾身家性命抢救护藏。民国时期郑振铎、清时丁丙昆仲便是很好的例证。

三是在培养人才方面,浙江藏书家为后代准备了“大摇篮”;

四是在促进学术研究、形成一代学派方面,浙江藏书家为后人提供了“信息库”;

五是在藏书理论、目录学编纂及藏书楼建筑设计和典籍护藏方面,创造和提供了丰富的经验。如元代藏书家高濂《论藏书》中的几点理论:“藏书为读、读书为用”的藏书目的,版本鉴别上的真知灼见,彼时书商作伪造假宋版书的种种手法。列举藏书家之外,作者还对多个时期的私家藏书风尚予以总结。如两宋时期士大夫藏书成为主流、抄刻并重、收藏图书之外兼及书画金石碑刻,明代的世家藏书、专题收藏、书画碑帖印章收集等。

三、浙江官府、书院、佛寺道观刻书藏书活动的一扇窗户

在我国古代藏书体系中,除私人藏书外,便是官府藏书、书院藏书以及佛寺道观藏书三大块。三者浙江藏书史上也都曾有过举足轻重的地位。而今,官府藏书演化为公共图书馆,书院及佛寺道观藏书也已成为过眼云烟。

1. 官府刻书、藏书活动

历代官府藏书分中央和地方两块。本书中所涉及的自然只是浙江省地方藏书。而杭州曾作为数朝首府所在,也曾有过中央藏书的地位。对地方藏书的介绍,基本也按照杭州府、嘉兴府、湖州府、宁波府、绍兴府、台州府、金华府、衢州府、温州府、处州府之次序排开。藏书处多为衙署、府学县学。衙署藏书多为法令与地方志等,大体只罗列各处所藏古籍,少数也提点藏书经阁。

本书所涉及的官府藏书脉络,大致如下:

五代时期,吴越钱王官府藏书亦富,惟迭经后晋天福六年七月及后周显德五年四月两次失火,图籍损毁颇多。吴越归宋后,将历年收藏尽数献于朝廷。

自北宋建国后,皇宫内设有专门保存、收藏皇帝御笔御札场所,如翰林御书院等。另外宫内皇帝居住、游宴、休憩之所,皆有藏书,供皇帝阅读和不时之需。

北宋馆阁之藏,自宋初起所积储藏书,至靖康之难时已全数毁于战乱。至于南宋一朝馆阁藏书,则全为建都杭州后重新征集、购置而渐复旧观的。南宋建都杭州,皇家内府、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皆例有藏书。秘书省在南宋时具有国家图书馆的功能。秘书省藏书来源,一是朝廷征书,士民踊跃献书。此外南宋杭州为全国出版业中心,浙江各府州县皆大量刻书,对增加秘书省藏书增加了来源。南宋国子监为全国最高学府,同时负有建阁藏书、刻印书籍等责。为了教学和出版需要,国子监收藏大批图书,为中央政府主要藏书机构。

宋代两浙之地,除普遍建有敕书楼以藏朝廷诏令等外,在府、州、县等长官办公署衙,例有藏书处所,所藏除法令等外,还藏有地方文献,以资治参考。另一处所为府、州、县学。府、州、县学是当地官办学校,安宋朝制度规定,各地官学在创办之初,都需要建有专藏图书的阁、堂、楼等。宋代浙江地方政府和学校藏书来源有:政府和学校刻书、朝廷赐书。

宋代刻书业兴盛,地方政府及学校刊刻图书,既可发展文化,又可充实藏书,且所刻之书投放市场,还可获利,故有见识的地方长官乐意为之。按通常惯例官署所刻之书一般为数十部至一二百部,这些书除多数分赠官员外,并留存部分以作署衙和学校的基本藏书。

宋代地方政府藏书的另一来源为朝廷赐书。宋代帝王颇多爱好与擅长书画。帝王所做诗文常以赐大臣,也赐给地方官府学校,为地方官府学校所宝藏,有的地方还专建御书阁以珍藏。又以宋代帝王重视文教,颁赐国子监书于各地学校亦为常事。

此外,地方政府和学校为治理地方与教学需要,采购、征集,甚或誊抄亦为致书之途。

元初由于战争灾祸,官私藏书均有所损失,但仍有发展,沿袭着前代的藏书、刻书传统。明代公私藏书都甚发达,其时在杭州的省级各衙署都有丰富的官藏,同时由于杭州为全国刻书的中心之一,为丰富书籍的收藏流通,省级官府衙署也刻印了大量的书籍。官府刻书一般要求都较严格,故而质量相对较高,这些官府刻书从另外一个角度而言,则是使官府藏书大量增加,丰富了官藏。明代浙江各府、州、县教育制度完备,府、州、县学多有尊经阁以藏书。

清代浙江官府藏书亦甚发达,迄至清末,受西学东渐的影响,杭州府等率先创办经官府立案的藏书楼或公共图书馆。清代官府藏书,主要形式为府、州、县学藏书。各级官学的藏书来源,一是清朝的颁赐,二是各级官府购置,三是地方官员和士绅的捐赠。其中朝廷颁赐之书是官学藏书的主要来源。1900年杭州府创办杭州藏书楼,是浙江历史上第一所由政府主办的面对广大市民的公共图书馆。浙江官府藏书之最盛者,

当属清杭州文澜阁。乾隆下令编《四库全书》,又命建江南三阁,将所抄七部《四库全书》之一贮藏于杭州文澜阁,以便江南士子之阅览。然咸丰十一年(1861)时,太平军攻打杭州城,文澜阁阁圯书散,幸有丁丙、丁申兄弟及时搜集、抄补,此套巨著才得以存留。光绪六年(1880)文澜阁得以重建。

民国时期,传统的官府藏书为公共图书馆所替代。各类学校所建的图书馆,主要为教学服务,不再承担贮藏一地文献之责。各级政府机关,所办的图书馆、资料室亦主要为部门服务,并不担负向外开放社会责任。1912至1937年为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期,全省各地先后兴办公共图书馆或通俗图书馆。1937至1945年为浙江公共图书馆事业遭受空前浩劫时期。在战火中,新兴的公共图书馆事业遭受空前浩劫,损失惨重,馆舍、藏书被毁。

关于官府藏书,尽管历来素有“藏书虽富而为帝王及蠹鱼所专有”,但其在浙江藏书史上的地位仍不可忽视。

2. 书院刻书、藏书活动

至于书院,由于藏书历来是书院除祭祀、讲学外的另外一大功能,所以其藏书量、藏书之功用都不可低估。

书院在唐代还只是官方藏书、校书和讲学之所,到了宋代演变成教育机构,它的特征是讲学、祭祀和藏书三位一体。南宋时随着书院的繁盛,书院藏书亦趋向繁荣。元代政府在重视官学的同时,对书院建设也很重视。书院进一步发展,并逐步趋向官学化。书院的讲学、藏书、祭祀、学田已形成制度。明代书院藏书不若宋元之盛,但由于书院虽为讲学之所,然教学亦为基本内容之一,因此都有一定的基本藏书。清代书院藏书亦较为兴盛。就浙江而言,文教发达,各府、州、县多建有书院。在各地书院中,讲学、祭祀、藏书三者是缺一不可的。凡书院必有藏书阁、楼建筑,所藏书籍以经史子集传统典籍为主,及至清之后期,由于西学东渐的影响,有些书院同时收藏西方译著和报章等,以供院中师生讲诵研习。

历来书院藏书住院有三:一是朝廷与皇帝的赏赐;二是地方士绅和官员的赠与;三为书院从书肆等处购书。对书院藏书的介绍,作者多先考证书院源流,再论其藏书。对元代杭州西湖书院的介绍即是如此,作者先论其变迁,从岳飞故地、南宋太学,到肃政廉访司衙署、书院、讲堂、尊经阁等,再考其经史子集各部藏书,有理有据,论述充分。

3. 佛寺、道观刻书、藏书活动

佛寺道观出于念佛诵经、传教传道、研解教义之需要,也多有藏书。所藏多为经书之类。对此类藏书处的介绍,作者也多追踪溯源,考其始末,再论藏书。杭州灵隐、净慈等寺都是绝佳的佛法藏书圣地,作者在书都一一介绍。

五代时期,杭州已开佛寺藏书之风,各名刹大寺都有佛经

收藏。吴越首开佛寺浮屠藏经。此时浙江已有道观收藏道教经籍的活动。宋代重视道教典籍的搜集整理编纂。多部经书刊在浙江,就地致书容易。加之历代宋帝有时敕赐御书、御札、经书之举,使浙江佛寺藏书更为丰富。和宋代一样,元代历代帝王多崇信佛教。元代帝王重祿《大藏经》的刊刻,刻成后又往往颁施天下寺院度藏。在这种氛围下,浙江佛寺刻经、藏经之风甚盛。道观亦有度藏道书的。清代浙江佛刹道观众多,由于历史的原因,加上清代各帝崇信佛道,故浙江佛寺道观,收藏经书颇多。佛寺道观的藏书来源主要有皇帝颁赐、信徒捐赠、寺观购藏。

总体来说,浙江藏书以私藏享誉全国,因此,书中作者官府、书院、寺院等藏书的介绍略为简单。

四《浙江藏书史》结撰的意义

自古以来,藏书事业的兴衰便与同时代文化教育的荣枯息息相关,而顾先生所撰《浙江藏书史》正式在这一背景下对

各期藏书事业展开了深入透彻的研究。从藏书与文化的切合上来说,一是藏书对文化的贡献。长期以来,纸质书籍都是我国传统文化的最主要的载体,古籍的世代相传不仅仅将这种载体传承下来,更重要的是其所记载的文化的继承与发展。浙江历史藏书的丰富以及藏书事业的源远流长,都为我们传统文化的流传起到了积极的作用。二是文化对藏书的影响。在文化繁荣兴盛的状况下,藏书风尚更容易被带动起来。相反,文化禁锢同时也是对藏书的限制。

值得庆幸的是,浙江的文化事业自古以来就走在全国的前列。因此,其藏书事业时常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,催生出如湖州陆氏及宁波范氏这样的大藏书家。傅璇琮先生在序言中说:“通过这部对整个浙江省的藏书史研究,确可看出我们浙江文化在全国的影响与历史上达到的程度。这部浙江藏书史所体现的地域文化的特点,必将有助于我们中国文化的整体研究。”

·读书声·

由《书声梦影录》所得独乐轩主人之读书观

郑闯辉

在当今时代,想要看到民国时期的文献已经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了。除非是文史研究或者文献学研究领域中的专业人士,其他人已经不再习惯看民国时期出版的用繁体字排版的书了。那么现在我们想要对民国时期出版的书有个大致的了解,看一些文化老人们写的书话,倒是一种不错的选择。如我手头上的《书声梦影录》(上海远东出版社2008年4月版)就是这样一种主要介绍民国时期文献的书,也有一部分涉及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出版的书。读后很长见识,增加了我对民国时期出版的文献的理解程度。

本书作者陈寒川先生生于上世纪三十年代,笔名“曼莎”,别署独乐轩主人,浙江永康人。早年考入北京大学图书馆学专业,旋因病辍学归乡,从此潜心学问,于中外文学、史学、文献学、金石书画、目录版本、古典园林以及佛学均用心勤劬,笔耕不辍。作者晚年把自己一生所见的比较好的书通过这本《书声梦影录》介绍给我们,如果有兴趣了解民国时期出版的旧书,

那么这部《书声梦影录》是非常值得一看的。他在后记中介绍写作缘起时说:

五六年来,我陆陆续续地写了许多书话散文,因为我见过不少好书,并且读过不少。写它就能唤起回忆,其中多少有点怀旧的影子。同时也好让人知道,哪些书是好书值得珍藏。近来我一场大病过后。为了抢时间,便把旧稿拿出来,拾掇一下,最终编成这个集子。

如此看来,这本集子的编成,可说是作者一生读书经验的总结了。《书声梦影录》所收录的篇目,分成四辑:

第一个是“峥嵘岁月”,共收录36篇文章,内容主要是红色文献。虽然作者说这一栏目里还收录了“有一定参考价值的反面材料”,可是我觉得只有一本《战争贩子脸谱》勉强可以算是反面材料吧,其内容收录的是14篇苏联作家写得痛斥战争狂人的文章。

第二个是“历史心声”,共收录32篇文章,内容主要是有